

## 评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

安 镇

《高加索的俘虏》是普希金于1821年3月在南方流放时期完成的第一部新型浪漫主义长诗。这部长诗完成之后,在送审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的有些诗句特别是表现了诗人反迫害和向往自由的诗句,如“献辞”中的“我很早就饱尝忧患,不断地受着迫害,我成了诽谤和愚蠢的报复的牺牲品;但是,我渴望自由的心却更加刚毅而坚定。”还有长诗第一部分中的“呵,自由!即使在这荒漠的世界上,他还得孤独地把你寻找”等,都受到了检查官们的曲解,窜改和删节。此外,长诗第二部分中的诗句:“命运之神,只给了她几个欢乐的夜晚。”检查官认为这是暗指夜间的情欲,将“夜晚”改成了“白天”,即“命运之神,只给了她几个欢乐的白天。”为此普希金曾十分气恼地写道:“检查官扼住了我的喉咙。我不想、不应该、也不能在诗句中使用‘白天’这个词。夜晚、夜晚、看在上帝的面子上,欢乐的夜晚实在太少了。应该说夜晚,因为白天她见不到他。请你读读这首诗吧。为什么要用‘白天’,而不用‘夜晚’一词呢?在这二十四小时之中,哪一刻不符合检查官的心意呢。”最后,检查官还下令禁止在《高加索的俘虏》一书的封面上印制普希金的画像。但是,长诗在1822年9月初次发表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给诗人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在批评界,除了《欧洲导报》的批评家对于长诗中“布尔卡”(毛斗篷)的吹毛求疵之外,都反映良好,甚至连《祖国之子》这样的刊物也称赞说:“在这部著作中,地方特色描写得清晰、准确。不论画面,感情,还是手法,都带有东方艺术色彩。”

普希金对《高加索的俘虏》也有过多次说明和反思。1820年3月24日,他在给格涅季奇<sup>①</sup>的信中写道:“我的诗作所叙述的故事本应发生在喧哗的顿河河畔,即位于高加索咽喉地带的格鲁吉亚地区,但我却将它移到了色彩单调的平原地区。”同年4月29日,他在给格涅季奇的另一封信中更详细地写道:“这首诗或故事(你想叫什么都可以)的缺点十分明显,所以我一再犹豫,考虑是否将它付印。由于提纲太简单,思路放不开,束缚了手脚。描绘高加索风光的那段是本诗中最好的部分,但没有同主人公的行动联系起来,只是对地理概况的介绍,近似游记文章。主人翁有两个,对他们性格的描绘近似小说写法,而不是诗歌的写法。它有什么特色呢?一个没有感情的年轻人遭到不幸,这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吗?在山民的凶残的本性面前,在车尔吉斯姑娘的美貌面前,男主人翁十分冷漠,无动于衷。这是可能的,但有什么感人之处呢?用迎合环境的故事使文章变得生动,这并不困难。俘虏俄罗斯同胞的车尔吉斯人可能是那位女郎的情人,她的父母和兄弟都可以写进去,而且要各具特色,但我忽视了。其原因,一是因为我太懒;二是这些好想法来得太晚,当时前两部分已经脱稿了,我无意再从头写起。您可以看出,对自己作品的偏爱并未使我失去理智,在《高加索的俘虏》这首诗中确实如此。但我向您坦白,我十分喜欢这首诗,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这首诗中有些诗句对

我十分珍贵。”

在1822年10月至11月间，普希金在给戈尔恰科夫<sup>②</sup>的信中谈到俘虏这一形象时写道：“我在他身上想要描写这种成为十九世纪青年特点的，对生命和生命享受的淡漠，灵魂的早衰。”1825年，在给拉耶夫斯基的信中说：“高加索的俘虏的性格不够典型，这说明难以成为浪漫主义诗歌里的主人翁。”1828年，他在《高加索的俘虏》再版前言中写道：“这篇短小的故事所以得到读者垂青，应归功于对高加索及其山地居民的忠实的描绘，虽然这一点人们很少提到。”1829年，他又在《阿尔兹鲁姆游记》中写道：“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本污旧的《高加索的俘虏》的单行本；不得不承认，我非常满足地把它读了一遍。一切都很脆弱，年轻、贫乏；但对许多事情的预测和表达却是十分真实的”。1830年，他在笔记中再次写道：“《高加索的俘虏》是我初次着力描写这种个性的第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它所以比我写过的一切都更受人欢迎，是由于其中忧伤的调子和一些景物描写。可是，尼古拉·拉耶夫斯基<sup>③</sup>、亚力山大·拉耶夫斯基<sup>④</sup>和我，都对那些忧伤的诗句笑了半天。”以上这些，对于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构思过程，以及从整体上把握《高加索的俘虏》一诗，都是大有裨益的。

长诗成功地刻画了主人翁俘虏的形象。虽然普希金自谦地承认“这是我初次着力描写这种个性的第一次不成功的试验”，但是，诗人“想要描写这种成为十九世纪青年特点的，对生命和生命享受的淡漠”的愿望是实现了。别林斯基在谈及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青年的特征时写道：“青年人对已逝青春的忧郁感，这种原本就没有任何憧憬的幻灭，这种在从事最有力的行为时的心灵的冷漠，这种含有冷酷精神的热血沸腾，这种不是因为享受过生命的华筵而具有的履足感，却只是为了代替冷漠和热望，这种在完全无所事事的，灰色的怠惰中对行动的渴求，——一句话，这种青春之前的老年，刚劲之前的衰颓，这一切就是普希金以来我们时代的英雄的特征。”同时还指出，“《高加索的俘虏》里的主人翁——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往后，在《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翁、《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罗亭》和《奥勃洛莫夫》中的同名主人翁身上，我们会看到一系列这种“时代英雄”，即“多余人”及其发展的轨迹。所不同的是，在《高加索的俘虏》里的主人翁身上所反映的，只是这类人物的最初的一些本质特征，即既反映了他们的觉醒，也反映了这觉醒的朦胧和不成熟；既反映了他们对贵族社会的不满和抗议，也反映了这不满和抗议的软弱与不彻底；既反映了他们对行动的渴求，也反映了他们渴求行动的缺乏明确的目标，等等。当然，反映更多的则是他们对已逝青春的忧郁感，憧憬的幻灭感，灵魂的冷漠和思想上的未老先衰，以及行动上的怠惰无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主人翁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即属于十九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的“时代英雄”——俄国文学中“多余人”艺术形象的始祖。

正因为如此，俘虏的形象才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虽然普希金这时对拜伦正“崇拜得发疯”，并想把俘虏写成“浪漫主义诗歌里的主人翁”，甚至还赋予这个物以巨人般的内在的伟大与奇特等特征，但现实主义的因素还是占了主导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诗人真实地揭示了主人翁的个人主义性质，即象维雅泽姆斯基<sup>⑤</sup>等人所指责的他对车尔吉斯少女悲剧命运的漠不关心，他没有下水去拯救她这一事实所表现的“缺乏人性”，等等。对此，普希金在给维雅泽姆斯基的信中申述了自己的看法：“关于《高加索的俘虏》，我还要再说一句。你说我的灵魂卑鄙，因为我没有为车尔吉斯女郎流泪。可你要他怎么办呢？‘他已看破红尘’，这就是我的灵魂所要表现的全部感情。有些人感到遗憾，因为那位俘虏没有跳到水中去救车尔吉斯姑娘。那就试试吧！我在高加索河里洒过水，掉进那条河里根本无法搭救，要

想叫我救出一个人，那只有魔鬼附体才有可能。我的俘虏是个审慎的聪明人，他没有对车尔吉斯姑娘产生爱情，——因此，他不去使自己淹没是对的。”而“审慎”绝不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主人翁的应有的气质，相反却是现实主义文学里个人主义英雄所不可缺少的特征。后来，在长诗《茨冈》和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普希金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那“只顾自己的意志”的“绝望的自我主义”者们的本质特征。其次，俘虏的非英雄主义的结尾和悲剧性命运，都具有明显的反卢梭主义的精神。卢梭向往人类原始状态的自由平等，并以此与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相对抗，还提出了“返归自然”的口号。普希金笔下的主人翁则与此相反，他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寻找自由，结果却成了车尔吉斯人的俘虏，在获得解放之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他久已厌倦的贵族社会中去。在这里，诗人批判了贵族出身的主人翁叛逆的软弱和不彻底，还说明了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寻找自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倒退行为，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俘虏形象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也表现在这里。

在长诗中，山中女郎的形象也被描写得十分美丽动人。车尔吉斯少女与俘虏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诗人理想化和浪漫化了了的另一种典型。她是大自然的女儿，不仅被一种粗犷的爱好自由的英雄情绪所渲染，而且还体现了车尔吉斯人民最优美的素质，——强烈而真挚的爱情和为之奉献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

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热烈诚挚地爱着俘虏这个年轻的俄罗斯人。每当皎洁的新月从阴郁的山峰后面升起，她便带着酒、芬芳的蜂蜜和丰盛的食品，从幽暗的小道来到俘虏的住所；她与他分享这秘密的晚餐；她同他用眼睛和手势谈话，这胜过彼此不通的语言；她用充满柔情的目光安慰他，还给他唱了不少动听的山歌。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对俘虏的爱情是绝对专一的，她对他表白过，她因为爱他，决不嫁给另外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如果有人强迫她这样做的话，她是不肯屈服和让步的。她知道这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她：她的父兄为了金银正准备将她卖给邻村的一个她所不爱的人；她要求父兄转变念头，否则的话，——不是毒药，便是利剑。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爱情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这可以由以下几方面得到证明：其一，当她知道俘虏早已另有所爱和正为此而悲伤时，她不仅对此表示理解，而且还请他原谅自己，说：“我很理解你的痛苦————请你原谅我的哭啼，也不要嘲笑我的不幸”。其二，为了让俘虏能与心爱的人相聚，她饮忍着即将失去的爱情的痛苦，锯掉了俘虏脚上的镣铐，并给了他自由，说：“你自由了，去吧！”其三，当俘虏悲愤地请求她一起逃走时，她断然拒绝说：“这怎么可能？你爱着别人————去找她吧，去爱她吧！”同时还祝愿他永远生活在爱情的幸福里。最后，当俘虏投入河中游近对岸时，她投河自尽了，这不仅因为她不能再与俘虏生活在一起，还因为她不愿使自己成为另一个女人对俘虏的爱情的障碍，当然更因为她已经到了完全没有退路的地步，仅就她放走俘虏一事，她的父兄乃至整个车尔吉斯人，都是不能容忍的。总之，与冷漠的、自私自利和“审慎”的俘虏相比，热烈真挚，绝对专一和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形象，就显得格外伟大而崇高。

毫无疑问，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了普希金对高加索生活的亲切感受。“在那时候我需要荒野的地方，珍珠般的波涛的地方，那喧哗的海，那垒列的岩崖，和理想的骄傲的女郎，和无名的痛苦……”普希金后来在《奥涅金》中回忆道，“常常，我梦见一些可爱的人物，于是我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她们的神秘的形象；以后缪司就复活了她们：这样，淡漠的我，就歌唱了山中女郎，我的理想，……”由此不难看出，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的形象体现了诗人的爱情的幻想和青春的理想，以及与十二月党人一致的献身精神。

关于高加索的自然风光和当地居民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在长诗中显得非常出色。正如别

林斯基基所说：“这是第一次，高加索的庄严景色及其强悍的居民被写进俄国的诗歌里——而且，从普希金的这篇诗，俄国第一次认识了那久已与之刀兵相接的高加索。”矗立云霄，终年积雪，巍峨壮丽的高加索，不仅使普希金惊叹不已，而且成了他的诗歌的摇篮；是它唤起了诗人的心灵的力量，并使他成了高加索真正的歌手。请看诗人笔下的高加索：“这一幅景色多么庄严！皑白的峰顶是积雪的永恒的宝座，屹然不动，象层叠的彩云凝固在天边，而群山中的那座高峰：埃利布斯，那庄严的巨人，头上闪耀着冰雪的冠冕，以双峰伸向蔚蓝的天空。”这首诗中许多写景的片断都是十分忠于大自然的，并且永远不会失去它的价值。但是，高加索雄伟壮丽的大自然景色，不是孤立的或作为附带的插曲出现在长诗中，而是作为全诗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当地居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长诗中，我们看到了车尔吉斯人原始单纯的生活习俗，他们的热诚好客和家庭生活的融洽，他们的格斗和迅猛不可阻挡的袭击等等，都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令人赞叹和倾倒。不过，诗人也并没有将他们的生活理想化，即没有隐瞒他们那种原始、野蛮和残酷的特征：“单调乏味的和平使好斗的心感到厌倦，寻欢作乐的节日游戏常常为残酷的节目扰乱。有时候，席间疯狂的笑闹伴以刀剑的挥舞，奴隶们的人头四处乱飞，年轻人鼓掌又欢呼。”车尔吉斯人的这种“野蛮的自由”尽管充满了诗意，但在诗人看来，它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对高加索风光和当地居民生活的忠实描绘，被普希金视为长诗中最好的部分之一，也是长诗受到读者垂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诗“结语”部分的思想是矛盾而复杂的。一方面，诗人歌颂了“双头鹰”<sup>⑤</sup>的“血腥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战鼓咚咚响”，并称赞俄罗斯将军齐加诺夫<sup>⑥</sup>、克特利亚勒沃斯基<sup>⑦</sup>和叶尔莫洛夫<sup>⑧</sup>为“英雄”，等等。对此，维雅泽姆斯基曾严厉谴责过普希金，认为“结语”是硬安上去的多余的尾巴，并给全诗“涂上了血腥”。他在给亚·伊·屠格涅夫<sup>⑨</sup>的信中写道：“普希金最后几句诗玷污了全诗，令我感到遗憾。克特利亚勒沃斯基和叶尔莫洛夫是哪家英雄？他们的作为有什么高尚之处？不外乎是一种黑色的瘟疫，是野蛮部落的瘟疫。他们这些十恶不赦之徒只会叫人须发倒竖，令人脊背发冷。在这点上，我对普希金很有气。他这种狂热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后来，俄国的革命民主派杜勃罗柳波夫等人，也对此有过类似的批评。应该承认，上述的一些指责和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却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即在谈到那些将军们时，普希金写道：“无论你的雷霆转向哪一方——你一路上就象黑死病，给异族到处洒满了死亡……”同时还指出，俄罗斯的武力并不能使高加索人民屈服，说：“我们流的血并没有用：仍旧是迷人的盔甲，仍旧是骠马和深山，仍旧是放荡不羁的爱情！”此外，普希金对山地居民不幸命运的同情也是很明显的，“呵，骄傲的高加索的子孙，你们被征服了，你们悲惨地死亡了”，“而关于你们所受的酷刑，人民的口中会悠久地流传。”从上面这些复杂的矛盾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所怀抱的一种善良的愿望——俄罗斯和高加索人民之间一定会出现和睦友好的新局面。在同拉耶夫斯基<sup>⑩</sup>将军交谈中，普希金就说过类似的话：“不能永远靠武力过日子，不能经常处于袭击的恐怖之中，应该结束这种生活，我们和睦友好地生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以它特有的独创与革新而成为俄国新诗的代表作品。首先，它与以往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不同：以往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看来天真烂漫，不是歌颂光明，就是以感伤的诗句献给心爱的人，一切都充满了愉快的田园诗的风味。这种诗歌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接触现实，它的现实是幻想的，因此，在它里面看到和听到的，是天才的绵羊和纯洁的鸽子的叫唤，牧童牧女的亲吻，情人的温馨的眼泪被悦耳的歌声打断，或者努力表现对死亡的感伤，重复老妇人的关于僵死、狐狸精、女巫和术士的故事，或者少女被死去的未

婚夫用咒语召唤到坟墓里去，以及诸如此类陈腐的神话糟粕。而《高加索的俘虏》一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其最大的意义是面向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并提出和回答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十九世纪初期俄国贵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这个问题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反映，从而构成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

其次，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一诗，与拜伦的浪漫主义诗歌（东方故事诗）不同：第一是结构不同，正如普希金所说：“拜伦很少注意自己作品的结构，甚至完全不把它放在心上，只要有几个彼此联系的场面，对于他那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景物来说，也就足够了。”这在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特别突出，结构上有意安排的不连贯和随意性是它们固有的特点，例如《异教徒》结构的特点就是浪漫主义的“自由”；在《海盗》第三章中，作者故意着重指出长诗结构上的自由手法。在提到古希腊之伟大的第一段的注释中，拜伦自己也说，他竟不知道为什么把另一首长诗（即那时尚未出版的《密涅瓦的诅咒》）中的诗句放在这里，并请求读者原谅。而在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中，就没有这种结构上的不连贯和随意性等缺点。其主人翁从被俘开始到被解放结束，结构情节不仅清晰可见，有条不紊，而且合乎逻辑，自然和谐。全诗的思想内容，也都分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完全不象拜伦那样，由于故意不把一切交待清楚，说完，以致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有时甚至摸不清事情的头绪，更看不出它们是怎样发展下去的。第二是人物描写上的不同，这也正如普希金所说：“归根到底，拜伦把握了，创造了和刻画唯一的一个性格（就是他自己），除了若干散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讽刺性的狂言暴语之外，他把一切都归结到这个阴沉，强大而又如此神秘动人的人物身上。当他着手写悲剧时，他就把这个阴沉，强大的性格的各个组成部分分配给每一个登场人物，这样就把一部壮伟的作品分裂成若干细微而不足重视的人物。”而在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中，就完全避免了这种人物描写上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的毛病。其中人物和人物之间不仅毫无雷同之处，而且还有明显的差别，象俘虏的“审慎”的个人主义与山中女郎车尔吉斯少女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非常明显，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即便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他的性格的发展也不是单一和片面的，象俘虏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性格，不仅使这一形象更加丰富和完整，而且还加强了它的社会典型意义。很明显，那种认为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是拜伦诗歌的简单模仿的观点，是多么的不符合实际。

最后，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一诗的独创与革新，还表现在它的不可模仿性这一点上。虽然在长诗问世之后，有许多浅薄之徒竞相仿效，如什么《车尔吉斯的俘虏》、《莫斯科的俘虏》，等等。但正如别林斯基当时所多次指出的一样，他们只是向诗人借来了和谐而嘹亮的诗句，还有一部分是表现了诗的美，这些都是构成普希金作品的外在的一方面的东西；可是他们没有从他那里借来深沉而痛切的感情，这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并成为艺术作品的唯一生命源泉。因此，他们仿佛是从自然和生活现象上滑过去，正象冬日的残阳的光辉滑过地面一样，而不是把全部生命浸润在里面；因此，他们只是描写事物或议论事物，而不是感觉事物；因此，他们的那些模仿性的作品永远不会在读者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会永存于读者的记忆里。而普希金之所以与他的那些模仿者不同，就在于他一方面不违背自己的方向的主流，永远牢固地抓住他所代言的那一部分现实；另一方面又能永远说出新的东西来。而他的那些模仿者们却一直没有以嘶哑的声音唱完自己的陈腐的，令人生厌的老调。从这一点上说，《高加索的俘虏》是一首历史性的长诗。你读它时，会感到它是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写出来的；也就因此，它永远是美好的。假如在我们的时代，有哪位多才的人以《高加索

的俘虏》的格调和精神写出一首长诗来——那么，它一定是一篇毫无价值的作品，尽管它在艺术方面也许远优于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总之，普希金的主观精神气质的独特性，和社会生活客观发展阶段的规定性，决定了《高加索的俘虏》一诗的不可模仿这一特点。

- ①尼·伊·格涅季奇（1784—1833），情诗诗人，翻译家，普希金的朋友。
- ②弗·彼·戈尔恰科夫（1800—1867），十六步兵师司令部军需官，普希金在吉希尼奥夫时的朋友。
- ③尼·尼·拉耶夫斯基（1800—1843），骑兵上将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同名的儿子，少将，高加索下诺夫哥罗德省龙骑兵团团长，普希金的好友。
- ④亚·尼·拉耶夫斯基（1795—1868），骑兵上将尼·尼·拉耶夫斯基将军的长子，上校，普希金与他有着奇妙的关系。
- ⑤彼·安·维雅泽姆斯基（1792—1878），公爵、诗人、批评家、普希金的好友。
- ⑥双头鹰，当时俄罗斯帝国的国旗。
- ⑦巴·德·齐加诺夫（1754—1806），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后战死在巴库。
- ⑧彼·西·克特利亚勒沃斯基（1782—1851），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受伤后隐退。
- ⑨阿·彼·叶尔莫洛夫（1773—1861），俄国征服高加索的将军。
- ⑩亚·伊·屠格涅夫（1784—1845），宫中高级侍从，旅行家，普希金的好友。
- ⑪尼·尼·拉耶夫斯基（1771—1829），骑兵上将，卫国战争英雄，1815年至1824年任基辅步兵兵团团长。

---

（上接第48页）

- ⑫《鲁迅全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3页。
- ⑬Morris Diokstain 著方晓光译：《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 ⑭董衡巽等《美国文学简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 ⑮马库斯·坎利夫《美国的文学》（上），美国大使馆文化处，1983年版第157页。
- ⑯邢广域《幽默的美学品格》，《文艺研究》1989年第6期。
- ⑰柏格森著，徐继曾译《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